

# 漢字與拼音字母的難題： 十九世紀晚期之前美國與中國的資訊交流<sup>1</sup>

Parallel Languages and Scripts: America's Early Contact with China,  
From the Early 18<sup>th</sup> Century to the Late-19<sup>th</sup> Century

楊 智 明\*

YANG Jyh-Ming

##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一、以英語和拼音字母書寫系統的觀點出發，探究 1860 年代中美尚未建立外交關係前，美國民間對漢字(Chinese character)的認識與印象；二、瞭解漢字和拼音字母兩種文字系統 (Writing scripts) 本質差異，及中美官方首次文書交流在文字技術處理的難題；三、指出二十世紀之前西方前對漢字的瞭解與努力，為近代西方漢學研究(Sinology/Sinological studies)的基礎。本文以分析文獻與檔案為研究方法，使用的主要文獻，如早期商務及教會人士在東亞航旅的書簡與紀錄，美國開國元勳 Thomas Jefferson 在 1818 年對漢字的看法、美國哲學學會理事長 Peter S. DuPonceau 在 1838 年出版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論文，及後續《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討論該論文及漢字本質等相關文獻，及從 19 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出版的英漢字典。此外，本研究也以中美官方 1869 年首批交換圖書計劃為例，探索美國國會圖書館處理漢字書目資訊的發展，了解美國民間及官方以英語為基礎，建構字母拼寫 (transliteration) 漢字資訊的早期發展歷程。本研究勾勒 18 世紀到 19 世紀末期，英語以拼音字母拼寫 (transliteration) 漢字的發展，以及訊息內容經過不同文字系統轉譯後的資訊落差。也從馬禮遜 (Rev. Robert Morrison)、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在十九世紀編纂的英漢字典中，探索拼音字母轉譯漢字的發展與困難，以了解漢字和拼音字母兩種文字系統 (Writing scripts) 本質差異，及民間官方文書資訊交流的影響。研究最後指出十九世紀之前西方前對漢字的了解與努力，為近代西方漢學研究(Sinology/Sinological studies)的基礎。

---

<sup>1</sup> 本論文翻譯及改寫自作者 2008 年未出版博士論文中之第四章及第五章(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原博士論文題目：*Lost in Transliteration: The Tolerance of Intelligibility in Chinese References in Western Bibliographic Practice..* 詳見：Yang (2008)。

\*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No.4, 2019.3 (pp23-48)

## ABSTRA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was established, its political leaders and traders planned to initiate direct trades with China. The first successful trade voyage was made in 1784 by an American cargo ship *Empress of China* and profits of the trip aroused the “China Fever” afterwards, little cultural interaction, however, actually occurred in the first forty years since the maiden voyage of *Empress of China*. Although the pioneer traders were not much involved in the cultural practice, some Americans, including many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19 century, did express their interest and curiosity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scrip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ritings and records regarding the efforts American people spent o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early 18<sup>th</sup> century to the late 19 century. Also,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irst book exchange pla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869, exploring how Samuel Williams prepared “The List” for the Chinese book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transliter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is research is thus able to gain some insight regarding the changes of transliteration schemes developed by Rev. Morrison, Samuel Williams, and Wades who compiled renown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 19 centuries. B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two writing systems, the case studies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help realize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early sinologist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sinology.

關鍵字：漢字、漢學、拼音字母、文字系統、譯音、美國國會圖書館

Key words: Sinology, Chinese character, alphabet, writing system, translitera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 一、美國早期與中國的接觸

美國建國之初，政商領袖便積極希望能和中國直接貿易。早在 1780 年代以前，美國民眾已有飲茶習慣，對東方的工藝也很有興趣。研究早期美國茶飲市場的文獻指出，飲中國茶一開始是英國上層社會的社交風氣，但到了十八世紀時已遍及美國，掌握茶葉貨源亦是最早促成直接貿易之主因。<sup>3</sup> 美國獨立戰爭之前，美國的茶葉市場

貨源被英國的商業系統壟斷，1784 年 2 月 22 日，首艘美國商船開航前往中國「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貨輪，由格林船長(Captain John Green)指揮，1784 年 2 月 22 日由紐約啟航，行經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後在 8 月 28 日抵達廣州。<sup>4</sup>翌年，滿載紅茶和綠茶，瓷器等價格不貲的貨物返航抵達紐約。<sup>5</sup>這趟航程的投資金額約為 12 萬美元，獲利則是 37,727 美元。紐約、波士頓、巴爾迪摩，諾福克(Norfolk)

<sup>3</sup> Roth (1988). p. 439-62.

<sup>4</sup> 在美國商船 *Empress of China* 號駛往中國之前，已有其他美國商船試著直航。1783 年 12 月，波士頓的商船 *The Harriet* 號載著人蔘欲前往廣州，但到了南非好望角附近，美國籍的船長 Hallet 不顧英國競爭對手的警告，把人蔘賣給英屬東印度公司，以換取相當於人蔘兩倍重量的綠茶，中美的第一次首航因此中斷。詳見：Lee (2016).

<sup>5</sup> Smith (1984). p. 172-173.

等大西洋沿岸港口因此掀起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sup>6</sup> 狀。」<sup>8</sup>

「中國皇后號」首航成功，帶動了更多中美直航貿易。在 1785 年後，兩方貿易穩定攀升。茶葉並不是貿易商向東方採購的唯一商品，美國對於中國的香料、絲綢、棉紡、瓷器、玉器，象牙還有其他的奇珍異石等都很有興趣。

然而，儘管從早期的貿易接觸就可以看出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利潤可觀，但是首航之後大約過了四十年，雙方仍只是在商言商，幾乎沒有文化交流。當時中國官方政策要求外人須由「行商」控管，待在廣州城外，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情形，外國人不准進城。所有交易和溝通，得透過地方官吏，以所謂「洋涇濱」式混雜語言 (pidgin English) 進行。由於洋涇濱式英文華人學習容易，英美人士也多加配合，使得洋涇濱不可思議地成為在太平洋地區流行的語言。<sup>7</sup>然而，早在 1830 年代，一位曾住在廣州城外的外國人便指出：「任何到廣州的訪客，必會驚訝地發現，當地人和外國人怎麼會用那種怪異的術語互動，那簡直就是一切誤解的主因。這種情形到處可見，兩方各說各話，爭吵，拘留、惱怒、各種惡形惡

雖然美國政府早在 1786 年就指派了「廣州領事」(Consul for Canton)以支援民間商務，但所謂的「領事」，充其量只是廣州洋商的領頭羊而已。實際的情形是：中美首次直航貿易過了半個世紀之後，「領事館還不曾找到一位翻譯員」。<sup>9</sup>事實上，一直到 1843 年，中美首次簽定望廈條約前，中國官方才正式認同美國領事的身份。<sup>10</sup>

當時中國人並無意願教外國人學中文及史國的文化。中國政府也不允許外國公司以字母拼寫名字，雙方不易有實質的文化交流。<sup>11</sup>根據文獻記載，在 1820 年代，西方人和中國人都還互相以「野蠻人/Barbarians」形容對方。<sup>12</sup>資深的歷史學家 Dennett(1941)因此這麼說：「的確，美國人在廣東和中國人做了 45 年生意，但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公民可以確切地讀、寫，了解或說中文。」<sup>13</sup>

第一位透過正規學校制度學中文的美國人，可能是 William C. Hunter(1812-1891)。他在 1825 年，年僅十三歲時抵達「麻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學

<sup>6</sup> Liu (1992).

<sup>7</sup> 參考：Leland (1910).

<sup>8</sup> 詳見 Chinese Repository(CR), 引自 CR(《中國叢報》，1832, 1(1), p. 1.

<sup>9</sup> 引自 Dennett (1941), p. 63.

<sup>10</sup> Liu(1992), p. 14-15.

<sup>11</sup> 柏楊(1992). p. 991。

<sup>12</sup> Pereira (1961), Ch. IV.; Ch'en (1979), p. 96

<sup>13</sup> 引自 Dennett (1941), p. 63. 在這個引句中，「45 年」是指從 1784 年美國商船首航中國抵達廣州，一直到 1829 年第一位傳教士抵達中國。可參考本書第三章，有更多早期美國與中國貿易的細節。

了一年半的中文。<sup>14</sup>之後，在中國待了幾年，並在 1880 左右出版了兩本英文的小冊子介紹他在十九世紀在中國的生活。<sup>15</sup>

到了 1820 年代末期，美國民間和官方組織希望能促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最致力於推廣的單位，包含美國公理會差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還有美國政府。美國公理會差會在 1829 年派了兩位傳教士，David Abeel 和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裨治文) 前往廣州，他們是兩國文化交流的先驅者。美國政府則是透過與中國官方締約的基礎建立商務關係。有些學者認為 1830 年是美國漢學發端的年代，正是因為美國傳教士早年的貢獻。<sup>16</sup> 以上的案例大致勾勒美國人早期對中文及中文書寫系統的關注和努力。應可公允地說，在 1830 年以前，美國人對「中國」，中文和漢字等概念，仍是一團迷霧。

## 二、對漢字系統的好奇

最初前往中國經商貿易的美國人，對中國文化幾乎無從涉入。有些西方人曾表達他們對中文的興趣和好奇。其中一位是英國的船長 Basil Hall (1788-1844)。他在 1816 年航行到東亞，並在兩年後出版了他的旅行日誌。當時 Hall 發現東亞各國人的口語並不能互相溝通，但各國卻可以用漢字互相交流，猶如在國際間可以兌現的通貨 (The Chinese character was readily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他說：「未來 (在東亞) 的航程，如果有能寫漢字的人隨行，便可以解決與當地人打交道的難題，可以處理對陌生人不信任，以及讓渡管理等相關問題。」<sup>17</sup> 由此可見，西方人認為很難在東亞打交道，但是能用漢字就會方便許多。

有些學者認為，美國開國元勳之一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是最早在文獻中提到對中文有興趣的美國人。<sup>18</sup> Jefferson 曾在一封註記書寫時間為 1818 年 7 月 20 日給朋友的信中提到：

比起商旅的影響，讓人更好奇的是中國的科學到底是什麼狀

<sup>14</sup> 麻六甲在今之馬來西亞。宋晞(1962)指出 William C. Hunter 在英華書院進修之後，受僱於一家名為 Canton Factory of Thomas H. Smith of New York 的公司。而且後也是該公司的股東。詳見：宋晞(1962)，p. 137。維基百科建有「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 之辭條及個人簡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B%89%C2%B7%E4%BA%A8%E7%89%B9>

<sup>15</sup> William C. Hunter 所寫的兩本書為 *The Fan Kwae in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882)。另一書是 *Bits of Old China* (published in 1885)。詳見 Hu (胡述兆)(1979)之說明, p.31 & 59。

<sup>16</sup> 欲了解早期美國傳教士如何前往中國，以及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可參考 Latourette (1917)。

<sup>17</sup> 引自 Hall (1818), p. 57。本書 1990 年曾再版。Sharron McCune 教授曾指出，這本書因為很多人都想參考，因此出版後需求量大。1818 年的日記是美國最早出版的版本。第二次再版則是在英國出版，那時英國剛經歷 19 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正待尋找海外市場，擴張貿易。Hall 的日記在 1975 和 1990 年時也曾再版。

<sup>18</sup> Hu [胡述兆](1979)。P. 30.

態？漢字那麼複雜，字數那麼多，而且難以表達，這樣能帶動多大的進步？大概要花一輩子才能學會那麼多字，而且也難以完整地表達各種意思。我想，總有一天他們會不會突然注意到歐洲字母簡單易懂，經過一些改良後能讓他們的語言就像歐陸語言一樣，更容易表達意見？這樣他們會更容易進入科學的領域。我想，如果傳教士先教他們學會我們字母的好處，可能他們反而比較會接受福音，而不是很突兀的要向他們介紹一些他們心裡還難以想像的新領域。<sup>19</sup>

Jefferson 認為，書寫系統的問題，事關重大。他上述的那封信不只點出了漢字困難的程度，而且也影射：不論是溝通或發展科學，西方字母都比漢字優越。Jefferson 提到「傳教士要教他們使用字母」的想法，顯然對後來東西接觸時傳教士的角色也有預示或提示的作用。

西元 1838 年，美國哲學會(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理事長 Peter Stephen DuPonceau 出版了一本內文有 375 頁的長篇論文，書名是

《中文書寫系統及其本質之論文》(*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他根據所知有限的中文，以及相關的理論及資訊，建構了一些備受後人批評的論點。當時，許多讀過這本論文並且已實際在中國生活經驗的讀者，即認為 DuPonceau 本人應該並不會說或讀寫中文。事實上，這本書出版後不久，第一份在中國印刷和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便將該論文的整章「介紹」(Introduction) 在當年十一月號的期刊中完整刊出。在那一期內容的最後，期刊主編指出：「DuPonceau 已不遺餘力地出版了他的論文，但是...他似乎是在暗室中摸索(seems to have groped in the dark)，顯然他在某些觀點上是錯的。」<sup>20</sup>

西方國家自從航海大發現時期後，對中國文明及其書寫系統開始感興趣，但是大約到了美國開國元勳 T. Jefferson 和英國船長 B. Hall 的時期，英文中「表意文字」(ideographic)的新概念才開始浮現，凸顯出漢字與其他書寫體系的不同，雖然表意文字最早是指埃及最早的象形文字，但是現存的書寫系統中漢字獨樹一格。<sup>21</sup>大約也是在 19 世紀初期左右，英語世界的國

<sup>19</sup> 引述自 Jefferson's letter to Charles Jared Ingersoll on July 20, 1818. 這封信收錄在 A. E. Bergh (Ed.). (1903). *The Writing of Thomas Jefferson*, XIX, 262. Jefferson 寫這封信給 Charles Jared Ingersoll 感謝他帶了兩本中文書給他。

<sup>20</sup> DuPonceau 這本書的介紹部分，《中國叢報》在 1838 年 11 月號曾刊出全文。詳見 *Chinese Repository*, 7 (November 1838), p. 337-353. 引述出自該報編輯，p. 353。衛三畏曾於 1849 年在《叢報》撰文批評這篇論文，認為該文是篇大費周章去臆測的文章。*Chinese Repository*, 18 (1849), Samuel Wells William comments that the work "is a labored treatise upon a figment." see p. 408.

<sup>21</sup> 牛津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首次提到 ideographic 這個字，是在 1822 年，用來說明埃及的書寫系統 (Egyptian writing)。法文中首次出現表意文字 "idéographique" 也是在同年。詳見 Robert (1977), p. 957。欲了解西方早期如何介紹中文的書寫系統，可參考 DeFrancis

家開始比較密切注意中文。<sup>22</sup>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中國和英語世界的商人及傳教士往來愈來愈頻繁，儘管許多中國人百般不願和西方人接觸，但終究還是遇到了湯恩比 (Arnald J. Toynbee, 1889-1975)所說的：「兩個體質完全不同的社會，由一邊執意要入侵另一邊的歷史發展後，雙方不免衝撞。」<sup>23</sup>

### 三、探索漢字的本質

西方對漢字的認識，到十九世紀初已從一種書寫系統，發展成跨領域的探索。<sup>24</sup>在漫長的發展中，來自漢字文化圈以外對漢字漢語的觀察，常出現與中文學術傳統文字學(小學)不同

的洞見，而這些見解都不是快速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觀點是如何建構的？<sup>25</sup>DuPonceau 論文的讀者推測，DuPonceau 可能對越語有些了解，但不懂中文，他的論點是以越語文字推論漢字。最重要的，這篇論文忽略了越語的書寫系統，除了法國殖民後採用的羅馬字外，還有另兩種文字混合構成，一種是字漢(又稱為漢字，即中文的漢字)，另一種是字喃(又稱為喃字，類似漢字，由漢字修改而成的南方漢文系統)，字喃大致用在書寫地方越語的內容。<sup>26</sup>

從早期論者對 DuPonceau 論文的批評來看，十九世紀前期以前，想深入鑽研中文書寫系統的西方人，除了非常少數特例，都未曾在中國生活過。<sup>27</sup>DuPonceau 對漢字的見解，大致是來

---

(2002). 了解漢字本質，可參考 Qiu [裘錫圭] (2000).

<sup>22</sup> 1815 年時，蘇格蘭神父馬禮遜 (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出版了第一部英漢字典：*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title: 通用漢言之法]，這是當時英語世界學習漢語最完善的工具書。欲了解英國早期漢學的發展，可參考杜維運(1962)。

<sup>23</sup> 引述自 Toynbee (1973), p. 341. 引述句中所指的「衝撞」(crash)，是指西方引發的鴉片戰爭 (1839-42 and 1856-60) 以及因外力入中國的各式衝突。

<sup>24</sup> 將文字系統視 (writing script) 為技術的探索，甚至電子書寫與早期在紙筆上書寫的研究，長年來均為學界所關注。近年亦愈有跨領域研究的趨勢。大約從 1990 年代開始，漢字的文化現象及文化史之著作研究漸多。漢字部分可參考周有光(1996, 2000)及何九盈(2001)。日文書寫系統可參考 Seeley (1991)，Taylor & Taylor (1995)則以比較研究的途徑，了解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發展。此外，Hannas (1997)提供了文字發展較巨觀的視角，了解東亞漢字文化圈與拼音字母為主的西方世界交流時，所遇到的拼寫轉譯的困難。Graddol, Cheshire & Swann (1994)等語言和文字學的研究文獻，也廣泛地介紹和比較世界各地文字系統。

<sup>25</sup> 西方在符號學，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發展上，都曾以漢字為標的，探索漢字與拼音字母的不同。符號學的先驅者 Saussure(1966)，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學者 McLuahn(1964)，Logan(1986)都從書寫系統的角度出發，延伸探討漢字的特質。此外，中文研究持續反思文字學並不是只為服務經學的「小學」，可參考：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中文學門小學專刊》中文學門小學類文字學領域的困境與省思。<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80342b2f-0856-409c-afa7-fe9461968f2a>.

<sup>26</sup> 東亞地區的書寫系統，除了漢字之外，另有從漢字發展出來的漢系文字(Sinitic script)，如日本的假名系統，韓國的諺文，以及越南的字喃等系統，相關論述架構可參考 Boltz (1996)。特別是該書的附錄：“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East Asia”。

<sup>27</sup> 16 世紀末到十七世紀，明末清初期間，歐洲天主教的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曾來華傳教，甚至受封成為中國的官員。但到了十七世紀後期，清國開始實施禁教，海禁及瑣國等政策，雖有對外交易，但文化交流遲緩。

自當時進口到美國的一本交趾中國字典(Cochin China Dictionary, Cochin china 在今之越南)。而那本字典,是由意大利籍神父 Joseph Morrone 在西貢撰寫的,這位神父並非漢學家。<sup>28</sup>對於早期的漢學家而言,這種僅以字典或出版品文本探索漢字本質的方式其實很普遍。然而,對美國人來說,這種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也開始改變。中國的門戶被西方打開(China-opened),「中國現在也樂於開放和我們做生意。」隨著一群有如學者的傳教士陸續來東亞,發行了各種不同的出版品,DuPonceau 的論文自然會受到較仔細的檢驗。<sup>29</sup>

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在 1838 年出版了 DuPonceau 的論文後,在廣州的美國傳教士,很快就回應對論文的看法。傳教士們認為,那篇論文因為作者不懂中文,論點令人難堪。《中國叢報》長篇而詳盡的文章評點這篇論文:「不必說太多也可以知道,這論文就像在其他任何一種科學遇到的困難,因為文字

的濫用、作者不斷比喻而非清楚易懂的語言論述、解釋的程序又超出了問題的本質。」<sup>30</sup>傳教士們對文章提到的許多案例上都不認同 DuPonceau 的觀點,也不贊同論文導出的結論。傳教士們認為,要了解中文的書寫系統,較好的方式須透過在地接觸才能有紮實地了解當地語言文字。

《中國叢報》發表對 DuPonceau 論文的評論時,距這些首批傳教士抵華的時間已有八年,這八年也是美國人對中文及漢字奠立基礎的時間。和其他西方國家發展漢學的時間相比,八年的時間相對而言是較短的。<sup>31</sup>但美國傳教士不像其他歐陸的先輩「在暗室中摸索」,他們已經在日常生活與中國人建立實質的對話語言環境。<sup>32</sup>他們的努力撒下了研究漢學的種子,《中國叢報》在 1832 年到 1851 年間,以月刊的形式在廣州出版。在出版的前十年就可以看出傳教士對中文已有相當興趣及逐漸累積的知識基礎。主編常常刊出對於中文和漢字的知識和案例。而且,《叢報》從一開始就在活版印刷

<sup>28</sup> DuPonceau 的研究細節及歷來對該篇論文的分析,可參考 Chao (1940) 及 Goodman & Swiggers (1994)。此外 Smith (1983) 亦提供了 DuPonceau 研究漢字的歷史背景。

<sup>29</sup> China Opened 是 Gutzlaff (1838) 的著作。這本書一開始便有 Andrew Reed 所寫的一段話: “China is now happily open to our commerce: China will soon be open to our more general intercourse: and China will eventually be open to Missionary enterprise. It is therefore a favourable and an indicative circumstance, that it is being opened to our understanding by a variety of useful publications; some of them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s works of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詳見 Gutzlaff (1838)。

<sup>30</sup> 引述取自《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CR), Nov. 7, 1838/(7), p. 337。這一期《叢報》對 DuPonceau 的論文有詳細的討論,詳見, p. 337-353。

<sup>31</sup> 漢學在歐洲國家開始發展的時間不一。譬如,法國學者認為法國的「漢學元年」是 1814 年。一篇題名為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 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發表。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漢學開始的時間為 1830 年,大學首先開始有中文的教席。Wilson & Carley (1995) 一書中的論文,介紹了漢學在歐洲國家早期發展的情形。

<sup>32</sup> 提出批評的美國傳教士 Bridgman 在《中國叢報》的文章中指出 “Mr. DuPonceau has done well in publishing his essay; but, like all his predecessors in the same field, he seems sometimes to have groped in the dark; and it will yet appear that on some points he is in error.”

上使用漢字鉛字，表達和說明有關中文的想法。月刊中出現的第一組漢字是「朋友」。在 1832 年 6 月號的文章中，在該期的月刊中，這組漢字拼字為 *pányew*。<sup>33</sup>

從《叢報》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教士不只關心中國的各種現象和議題，同時也自己做研究。後期的漢學研究文獻大致也認同《叢報》提供了解中國的珍貴資源，而且也是西方社會專注於中國問題所出版的的第一本期刊。<sup>34</sup>從這些角度回頭來看，DuPonceau 和他的論文，對於了解語言和書寫系統上其實頗有貢獻。至少從相關的評論上，已開始探索語言和書寫系統，也指出文字系統會引領出不同的議題和問題。事實上，多種語言和書寫系統建構出的複雜結構，也正是漢學重要課題之一。因此，像「DuPonceau 以法裔美國人的眼光去看越南的文字，對解釋外國書寫系統本質，必然會有一定侷限」這樣的批評，是有失公允的。<sup>35</sup>真正的侷限並不在國籍或研究者的立場，而在於對於語言是否有實際的了解。畢竟，就算是使用同一種書寫系統的語言，彼此也不見得是有關連的。何況越

語使用了漢字和從漢字改造而成的字體書寫其語言。

更進一步說，就算不同的語言共用相同的文字系統，也不代表這些語言的音素總量相同，而不同語言間的發音和拼寫的原則也未必相同。這裡用一個方便的例子說明：對美國人來說，DuPonceau 名字的拼寫方式通常是：Peter Stephen DuPonceau，但是他在法國出生時的名字是 Pierre-Etienne Du Ponceau。<sup>36</sup>這兩組名字的拼寫不同，是因為法文轉為美語發音之後的視覺呈現結果不同。再舉一個例子，第一位從德國被派到東亞貢獻甚多的 Rev. Gutzlaff (1803-1851) (中文姓名：郭士立牧師)。他的德文名字全名是：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轉為英文出版品上最常見的拼寫方式則變成 Charles Gutzlaff。這兩組名字的拼寫方式都是拉丁字母，但是就語言的觀點，母語的名字具有較多的訊息。<sup>37</sup>

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共派遣了九十八位新教傳教士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前往中國傳教，他們在地

<sup>33</sup> 詳見《中國叢報》。CR, June 1832, 2:65。

<sup>34</sup> 依尹文涓(2003)的分析，《中國叢報》的內容對美國漢學最初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sup>35</sup> 許多對 DuPonceau 文章之批評，焦點都在漢字到底算不算是表意文字(ideographic system)。讀者可以參考以下網址，了解 DuPonceau 的文章及漢字是否為表意文字的迷思 ([http://pinyin.info/readings/texts/ideographic\\_myth.html](http://pinyin.info/readings/texts/ideographic_myth.html)，最近流覽日期：9/25/2018)。

<sup>36</sup> 在許多美國地方圖書館的目錄(local library catalogs)中，DuPonceau 名字的拼寫方法只有登錄為美國人較熟悉的形式 (DuPonceau 而非 Du Ponceau) 要用 WorldCat 或多種語言的蒐尋引擎才容易找到名字以不同拼法記載的書目資料。

<sup>37</sup> Rev. Gutzlaff(郭士立牧師)的作品，有的以德文發表，有的則以英文發表。在他自己所寫的英文著作上 (非由德文翻譯為英文)，他的簽名是寫成 Charles Gutzlaff。但是在用德文寫成的書上，他則使用德文的名字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是: *Das Leben des Tao-Kuang, verstorbenen Kaisers von China Nebst Denkwürdigkeiten des Hofes von Peking und einer skizze der hauptsächlichen ereignisse in de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während der letzten fünfzig jahre*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這本書是在 1852 年出版。



方社區成立了學校。<sup>38</sup>雖然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數量和金額都大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貨品，但美國仍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產品未來的市場。<sup>39</sup>1831年12月，當時的美國總統 Andrew Jackson 發表的年度致辭中即表示，有意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於是美國在翌年派出了 Edmund Roberts 為遠東代表。這個安排離 1786 年中美首航貿易，已過了大半個世紀。然而，美國派出官方代表，並不意謂著中國打算接納來使開放往來，事實上，至少要再過十年，兩方的官方往來才會更進一步。<sup>40</sup>

#### 四、早期西方國家的漢學研究

根據文獻記載，法語的 Sinologie 一詞，最早在 1814 年，一篇記載中國研究的文章中(L'histoire de la sinologie)中首次提到。然而，這個詞一直到 1878 年才被收錄到法文字典中。尹文涓(2003)指出，美國漢學做為學術上被認肯的領域，大致是從 1832 年在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出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算起。<sup>41</sup>雖然西方國家對中國文明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十三，十四世紀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往東前往元帝國的時期，但大部分歐洲國家是在較晚之後才將漢學發展為學術領域。

法國人認為漢學研究的元年是 1814 年，大致因為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法蘭西學院開了中文課程。<sup>42</sup>在英國，漢學研究的開始大約從 1823 或 1825 年開始，因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分別是在這兩年建立。美國耶魯大學在 1877 年有首位中文教席，這位教席就是知名的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 1812-1884)。他辭去中國的職務返回美國後，開始在耶魯大學執教。這是美國第一所提供漢學教職的大學。

簡言之，美國開國的前幾十年，儘管雙方「在知識和道德上少有往來」，但美方一直希望和中國貿易。<sup>43</sup>到了十八世紀晚期，美國政府開始派遣商務代表前往中國尋求貿易機會。此外，美國的教會也從 1829 年起派傳教士來中國，但開始時仍是以傳道為其要務。

#### 五、晚清時期中美文化接觸：以兩種文字交流資訊的難題

中美關係一直到 1860 年代，雙方官方的接觸才開始活絡起來。美國共和黨的元老之一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位外交官，不但是美國首位駐華公使，在他駐華任期結束後，

<sup>38</sup> Liu(1992), p. 12-13.

<sup>39</sup> Morse (1920), p.130-131.

<sup>40</sup> Richardson, J. D (Ed.). (1917), p.551.

<sup>41</sup> 尹文涓(2003), p. 29.

<sup>42</sup> 詳見方豪(1959), Chapter 1 in Volume 1.; 陳堯聖(1962), p. 186.

<sup>43</sup> 「在知識和道德上少有往來」引自《中國叢報》1832年五月在廣州發行的第一期首頁的內容。作者是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是美國第一位抵達廣州的傳教士(1830年)。他在 1832 年開辦了叢報而且擔任編輯一直到 1847 年。

亦曾受邀成為中國到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巡迴大使 (Roving Ambassador)。<sup>44</sup>

1867年，蒲安臣駐華任務即將結束，就在他辭職返回美國的前一年，史密尼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提案希望能和中國政府進行書籍交換的計劃。隔年，該計劃由當時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代辦的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負責。在美國方面，有三個美國官署希望能得到中國的出版品，其中美國農業部特別希望得到中國農業的資訊，因為中國歷來以農立國，農業養活了眾多人口。美國農業部甚至派了一位專員到中國洽商農產事務。但在中國方面，對交換計劃的回應非常緩慢。負責的單位是總理衙門及外務部，這些單位對於交換書籍並不熱衷。這個計劃光是交涉大概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最後中國政府總算同意交換一些書籍和植物種子。1869年年底，九百多本中國書籍運抵美國，送進了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sup>45</sup> 這批交換書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語言中最早的一批館藏，也由此開啟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

東方藏書(Orientalia collection)。<sup>46</sup>

在書籍交換計劃交涉的兩年中，美國農業部及當時新任的部長勞文羅 (Joan Ross Browne) 希望得到中國農產資料的動機愈來愈強，但是語言和文字系統仍是橫在兩國之間的最大阻礙。衛三畏曾寫信給當時史密尼森學會秘書長 Joseph Henry 教授，建議交換計劃不必急切。「到目前為止，我相信全中國沒有幾個人能完全了解這些書(交換到中國的英文書籍)，但美國境內能了解中國政府交換過來的書的人數可能更少。所以此時此事不必操之過急。」<sup>47</sup>

事實上，勞文羅稍晚在寫給他美國朋友的信上也承認：「到目前為止(這封信上註記的時間是1869年7月1日)能讀中文的美國人，比美國州 (state) 的數目還少。雖然目前能讀英文書的中國人的人數可能多出很多，兩方能多了解彼此的文獻才比較容易促進交流，而且也會比較在乎彼此。」<sup>48</sup> 勞文羅寫這封信時，美國有37州。

<sup>44</sup> Latourette (1917) 提供了早期 1784-1844 中美貿易和外交關係的歷史。Fairbank (1964) 一書有 1842 到 1854 年雙方往來的分析。Liu (1992) 研究橫跨的時間較長，從 1840 年到 1990 年。另 Hsü (1995), p. 296-98, 299 & 305. 亦有簡介早期雙方官方互動的歷史。

<sup>45</sup> 錢存訓教授曾研究 1869 年中美政府首次書籍交換計劃。詳見 Tsien (1964/65)。

<sup>46</sup> 除了錢存訓教授曾研究中美政府首次換書計劃外，Yu (1979) 指出美國東方學會的圖書館 (the library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在 1840 年代亦曾有一批 140 冊的中文藏書。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美國圖書館最早較有規模的中文藏書並非美國國會圖書館與清政府在 1869 的書籍交換計劃。詳見 Yu (197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 (1843/49), xii, xiv, under "Donations to the Library".

<sup>47</sup> 引自 Tsien {錢存訓} (1964/65), p. 21.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is reference came from a reply from the American Legation in China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ated April 17, 1868." 另外，美國農業部部長的中文名字亦值得一提，在許多研究的論文和檔案中，這位部長的名字多被記為「勞文羅」，但在清政府的官方紀錄中，這位部長的名字寫為「勞文羅斯」。詳見：同治朝籌辦夷辦始末卷六十二。

<sup>48</sup> 引自 Tsien (1964/65), p. 30. 這個引句最先的出處為 1868 年 7 月 3 日部長寫給國務卿的書信。"from a note s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dated on July 3, 1868, after Browne had an interview with Prince Kung at the Chinese Foreign Office, on July 1, 1868."

中國政府方面，從 1860 年代早期，國家已正式興辦學校訓練翻譯英文及其他外語的人才。<sup>49</sup>這段交涉過程可以看出美國希望能及早取得中國書籍。也因為交涉的努力，中國帝皇最後批准了這些送往美國政府的九百多件出版品的「禮物」。<sup>50</sup>

在了解美國國會圖書館如何處理第一批從中國交換過來的書籍之前，值得一提的是，DuPonceau 研究的越南文字其實在十九世紀晚期時正面臨關鍵性的改變。自從十七世紀以來，受到法國、葡萄牙，還有義大利傳教士的影響，越南人民開始使用拉丁字母書寫越語，並稱這種可以書寫當地語言音素的字母系統為**國語字**（Chữ Quốc Ngữ／杼國語），可以用來替代字漢及字喃兩種文字。<sup>51</sup>1862 年，越南與法國簽定西貢條約成為法國之殖民地。從那時開始，法國的政治影響力正式改變越語的書寫系統，法國政權也偏好使用字母系統。字漢和字喃受到壓抑而終在二十世紀初時由當權者宣佈廢除。<sup>52</sup>

越南書寫系統的改變，凸顯了在語言（口語）不變的情形下，文字系統可以改變；然而，這種書寫系統改變所

造成的影響，相關的研究至今仍不算豐富。在 1920 年前，越南的官方出生證明仍以字喃和拉丁字母形態的國語字書寫，但後來只有國語字一種文字。<sup>53</sup>除了姓名之外，越南語中有相當高比例的字詞是由中文而來，所以在中文常見的「同音異字」的現象，在越語中也同樣存在。國語字能否有效地區分同音的字詞(homophones)？<sup>54</sup>研究越語的學者發現，如果不具字漢和字喃的知識，要了解越語的改變必是「艱鉅的工作」(daunting task)，因為大部分語言和語源辨識的問題，都和書寫的字體有關。<sup>55</sup>許多問題和困難至今看來都還無解，但是許多西方作家認為越南的文字改革是「成功」的。而這種文字改革的所謂「成功」，到了二十世紀還可以看到更多的例證。

<sup>49</sup> 有關清廷自 1860 年代起訓練英語翻譯之相關資料，可參考瞿立鶴 (2002)。

<sup>50</sup> Tsien(1964/65), p. 19.

<sup>51</sup> 相對於日本，韓國及中國發展漢字以外的書寫系統，越南的拼音系統的研究較少。許多文獻指出漢字最常使用的地區，包含 CJKV(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這些國家或地區使用漢字的時間都超過千年以上。

<sup>52</sup> 1860 年代晚期，越南在經歷了中法戰爭後成為法國殖民地，政權一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完全由法方掌握。二十世紀初，法國政府要求越南將所有官方文件都要以傳教士建立的拼音制度轉寫。詳見 Glahn (1973), p. 29; Coulmas (1989), p. 114; 及 Jensen (1969), p. 183-5.

<sup>53</sup> Nguyễn Ngọc Bích (1984), p. 1.

<sup>54</sup> DeFrancis (1977: 8)指出，越語詞彙中有大約三成到六成的詞彙最被是從漢語中發展出來。Hannas (1997: 77) 則認為從漢語而來的詞彙比例可能低於百分之三十。

<sup>55</sup> Nguyễn Ngọc Bích (1984), p. 11-13.

## 六、書目清單 (The 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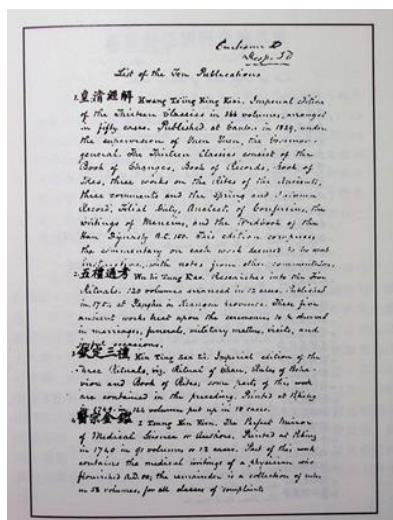


圖 1：第一批中美交換的書籍，1869 年送抵美國國會圖書館。上圖是由衛三畏所準備的書目「清單」。資料來源：錢存訓（1998）所著《中美書緣》，p. 13。<sup>56</sup>

中國政府送給美國的交換書籍，在 1869 年運抵美國的國會圖書館。預計要花兩個月的時間將書籍「分類及標註」(classify and label)，雖然並不清楚當時國會圖書館打算如何整理這批圖書。但現有的文獻資料指出，當時這批書籍有一個「清單」，是衛三畏以毛筆寫成。這個「清單」包含了十種出版品，最初用來建立目錄 (catalog) 的工具。以下是「清單」的首頁。載有第一部出版品完整的資訊。

皇清經解 Hwang Ts'ing King Kiai.  
Imperial edition of the Thirteen Classics  
in 366 volumes, arranged in fifty cases.  
Published at Canton in 1829,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Yuen Yuen, the Governor-  
general. The Thirteen Classics consis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Book of Records, Book of Odes, three works on the Rites of the Ancients, three comment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Record, Filial Piety,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writings of Mencius, and the Wordbook of the Han Dynasty B.C. 150. This edition comprises the commentary on each work deemed to be most instructive, with notes from other commentators.

以上引述的資料，除了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藏書的首筆書目資訊，亦可視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級圖書館如何處理中文書目案例的最初原型。當時，送抵國會圖書館的《皇清經解》共有 366 冊，分裝為五十函。這部經典 1829 年在廣東出版，由當時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所編輯。這個手抄的「清單」(The List)資料，是由當時任職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的衛三畏用毛筆謄寫。衛三畏後來也是美國大學中第一位中文教席，國際漢學中重要的研究者。

這個「清單」提供的書目資料，更像是對書目的「英文說明」，但無法針對書目產生「索引」或書目細項編目的功能。從兩種書寫文字系統的角度來看，這個「清單」是國際漢學發展的珍貴資源。它提供了文字系統在處理語言內容上不同的技術能力的例證，「皇清經解」四個漢字以形符傳遞的語義訊息，在字母拼寫後都無法傳達，字母以譯音代表書名，英文讀者也無法聽聲辨字；然而「清單」紀錄了漢字在特

<sup>56</sup> 錢存訓教授在 Tsien (1964/65: 27-28) 這篇期刊論文中抄錄了「清單」上的全文。並提供了清單第一頁的影像（如圖示）。這個資料也見於錢存訓(1998: 13)的《中美書緣》一書。

定時間和空間的譯音，顯然與目前官方的標準音值已多有不同。

以現今的角度檢視「清單」，恰巧也可以看出，1869年清單的目的只是讓英語的讀者了解書籍的大致內容。對於代表書名的四個漢字，只有轉為音譯的字母，當時並無題名的說明。對於題名/書目名稱〈皇清經解〉的翻譯，要到1880年代，亦即書籍已送抵國會圖書館大約二十年後時，才出現“Qing Dynasty Exegesis of the Classics, Commentaries on Confucian Scriptures or other alternative forms by difference sources.”這樣類似型態的英文翻譯。<sup>57</sup>亦即〈皇清經解〉是以字母譯音 Hwang Ts'ing King Kiai 表示，此書目並無正式的英文題名。

稍晚在1880年代以後出現的〈皇清經解〉翻譯，則比較像是書目資訊的註釋(annotated bibliographic notes)，而不似書名。而這些註釋有時提到經典中的個別書冊時，大致也是以英文訂其書名(如 Book of Change, Book of Records, Book of Odes 等等)，至於英文說明中所指的書名，究竟要對應到哪一本書(中文的書名)，即使具有中文和漢字的知識，仍無法依目錄而辨識出來。

就現今圖書編目標準而言，1869

年的案例問題叢叢。但這個最初的案例正是美國圖書館發展中文藏書的起點。衛三畏的書目，基本上是以字母和英文寫成，但書日本身的語言及書寫內容既非英文，也不是用拼音方式書寫。使得書目資料的建立必須考慮到資訊的兩種組態：即「語言」和「文字系統」(Language and script modes)。圖書中主要書目資料(main entry)，包含作者和書名，和它的文字系統習習相關，因為文字組態(script mode)決定資料取存的位置，排序等條件。

對圖書資訊來說，文字系統(script)是記錄書目資料的容器。以何種文字書寫，決定了書目資料的樣態，也決定書目資料排序，分類，語言及註解等管理條件。<sup>58</sup>「清單」(The List)中〈皇清經解〉四個字及其對應的 Hwang Ts'ing King Kiai 譯音，值得進一步分析。字母與漢字，不論就部首、形符或聲符，並沒有可以互通的符號基礎。由漢字轉為字母譯音時，形成兩種涇渭分明的資訊，漢字亟待辨識字形才能產生字義，字母側重保留音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的發音)。兩種文字形態的資訊如果沒有在同一筆資料中並陳，除非對語言或文獻熟悉，不然用字母/英語描敘的書目，並不容易直接找中文的書目或訊息。中文文言文的資料時如果沒有翻譯或只有譯音的資訊，判讀的難度更高。就如一位在美國東

<sup>57</sup> 《皇清經解》這部經典首次印刷出版的時間是在1829年。但大部分毀於鴉片戰爭。後來在1860之後再版重印。到了1880年左右，這套經典另有增補出版，這是清朝官員所整理最完備的典籍之一。這部經典的英文翻譯，後來曾譯為 *Qing Dynasty Exegesis of the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on Confucian Scriptures*，部分美國圖書館和參考資料也使用這個翻譯為書目資料，除了這個版本的翻譯外，也可以在圖書館找到不同的譯文。

<sup>58</sup> 文字是紀錄書目資料容器的說法，是根據 Logan(2000)相關媒介理論所做的闡述。Logan 在 *The Six Languages* 一書中指出所有語言的形式和特質，會決定這種語言在傳播和訊息學(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cs)上的功能。

亞圖書館工作的館員所說：「即使是最堅定的改革者都得承認，古文或半口語的中文文獻資料，用譯音/拼音書寫的方式表達，是無法理解的。」<sup>59</sup>

漢字和拼音兩種文字系統的差異，基本上是非口語的（non-verbal in nature）。這兩種文字系統所傳遞的資訊，漢字雖有音值，但可因時因地而異，字的發音也非固定於一音，漢字中單字和詞組的區辨須具有語文與文字的雙重素養，但轉為譯音字母後，判讀或還原困難，這些都與文字的技术能力有關。從〈清單〉便能看出差異。漢字透過字形(glyph)傳達語義，字母協助發音。書目中四個漢字的語音音質，已與當前種語音的線索在漢字不見得能直接看得出來。Hwang Ts'ing King Kiai 以字母為形式，但並不是英文的字彙，所以較難成為通行的語彙。這是「文字功能」(script mode issue)，而兩種文字的技术條件幾乎是平行而沒有交集的。

從「清單」上看，熟悉英文的讀者，對書目文字的「語言功能」(language mode issue)較不易查察出來。畢竟「清單」已翻譯為英文，字彙和語義上的了解不是主要問題。這個個案可以勾勒大約一百五十年前(1869年)，美國國會圖書館以非漢字的文字系統為中文古典書籍定出書名的首例。但以廣義的角度觀察，跨越國界、語言、文化邊界的書目資料，都可能須要轉換資訊的文字系統，也有提供書目資訊的必要。

以 Hwang Ts'ing King Kiai 為例，該部經典在收藏早期陸續增補了英文的書名(English Title)。每次有了新的書名，讀者即能得到新的資訊。如：Qing Dynasty Exegesis of the Classics 可以看出此部經典是在清朝篇纂。另一部書名，The Commentaries on Confucian Scriptures 可以看出是有關孔門經典的評述。因此，每當書名有新的翻譯，總能提供額外的資訊。然而，即便是再一百年後，以英文在美國各地圖書館訂出便於查詢的統一的書名，仍是困難重重，不過書目統一的問題，並不是本文目前要探索的重點。

其實，「清單」令人困擾的問題，並不只於書名。如果注意到清單首頁內唯一的人名 Yuen Yuen，更能體察譯音之不便。這個拼音可以看出名字中代表的姓與名兩個漢字，可能有相同或相似的音值 Yuen。但如果未考慮到這個拼音是何時，轉譯何種語音(方言)，對這個名字肯定會有誤解。查詢這部典籍，可知編纂者是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以今日漢語拼音規範，阮元會拼寫為 Ruan Yuan。阮元由於編纂了許多清季的出版品，他的名字出現在許多出版品上，值得細探當初衛三畏對這個名字的發音和拼寫方式。

以 Yuen Yuen 拼寫「阮元」，兩個同音字是否是抄寫上的錯誤或是十九世紀語音與今日不同？此外，十九世

<sup>59</sup> Ting[丁許麗霞](1966: 2)。這位作者同時引用了 John DeFrancis 的一段話：The point to emphasize is that mere transcription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will not do. Otherwise the thirty-eight or even more characters – not words – pronounced *i* with a falling tone really will cause trouble.” 漢語漢字的同音字非常多，與「意」同音且為四聲的漢字至少有 38 個以上，只提供拼音字母的譯音，不可能了解語文的內容。

紀中期，這兩個漢字在中國官話或地方方言的音值是什麼？參考成書於十八世紀的康熙字典約略可以找到官話發音的線索。<sup>60</sup>其中，「元」的發音並無改變，而康熙字典上對「阮」的切音分析，則指出「阮」字從《唐韻》，《集韻》和《韻會》為「愚袁切，音元」，可知18世紀「阮」的官話發音與現今不同。多部早期的韻書，如《唐韻》，《韻會》及《正韻》等說明此字為姓。以現今的漢語拼音規範，「元」拼寫仍為 Yuen。然而，「阮」則拼寫為不同音值的 Ruan。

衛三畏在「清單」上以字母拼寫的「阮元」，合乎當時當地的發音。但是如果沒有漢字的參照，Yuen Yuen 是何許人，甚或代表什麼概念，可能仍是難解的謎面。畢竟，當代漢字字典中 Yuen 的同音字(只記音素/音位，含各種聲調的變化)，至少在六十字以上，還未計入其他方言的同音字。Yuen Yuen 兩字譯音，可能代表數百組不同漢字的書寫。<sup>61</sup>

這個名字的案例，大致可以看出一個普遍的現象：漢字的發音因時因地多有不同，但是長期以來漢字形構相對是穩定的，並沒有因為發音而改變。但從拼音字母書寫的結果來看，時間(年代/朝代)和空間(方言/官話)都是

造成變化的因素。在不告知的前提下，字母所拼寫的漢字，至底是根據地方方言或官話的音值拼寫，亦很難判斷。

衛三畏非常了解漢字和字母間資訊轉換的困難。他同時知道，不只外國人很難學習漢語漢字，中國人讀寫其他拼音語言，也很困難。他在1848年時指出：「語言的本質問題很棘手，使得大家幾乎不能用自己原有媒介去學其他的語言。」<sup>62</sup>在十九世紀後期，他是美國發展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清單」主要是因為外交目而謄寫，為了服務英文的讀者。因此，讓「清單」具有英語的語言功能，是合理而且適當的。至於圖書管理的專業需求，可能並不是他的考量。畢竟，當時在美國能使用中文書籍的人其實太少了。然而，當時衛三畏也會不知道，國會圖書館要再經過幾十年之後，才有機會發展出第一套較正式的中文館藏目錄(Chinese catalog)。

「清單」的故事，尚未結束，但是要再進一步了解衛三畏如何以 Hwang Ts'ing King Kiai 拼寫「皇清經解」，得先了解由倫敦派遣來華傳教的傳教士馬禮遜(Rev.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以及馬禮遜獨自編纂的第一部英漢字典(《華英字典》)。

<sup>60</sup> 康熙字典是在18世紀初時明康熙皇帝在位時編纂。這部字典可以查到「阮」的音值(p. 1346)。字典中之切音分析發音如下：【唐韻】虞遠切【集韻】【韻會】【正韻】五遠切，音邗。.... 又姓。【廣韻】出輦留。又【唐韻】【集韻】【韻會】愚袁切，音元。【說文】代郡五阮關也。【前漢·地理志】作五原。【正韻】阮，古原字。康熙字典之內容，可以在網上查詢：<http://www.kangxizidian.com/index2.php>

<sup>61</sup> 現今中文字典中，「元」(漢語拼音：yuan)的同音字至少在六十字以上。衛三畏在1889年自己所編纂的字典中(也就是在他提出「清單」二十年後)，以yuen代表的音節中，所列出的漢字共有：宛、淵、元、原、源、垣、爰、袁、棖、轅、遠、苑、員等字。詳見：Williams (1889:1249)。值得一提的，這個音節中，並沒有「阮」字。

<sup>62</sup> Williams(1889), p. 579。

漢字寫成的名字，轉寫為字母拼音時，資訊之轉換如魔術一般。漢字偏向視覺，字母卻偏向聽覺。衛三畏把「皇清經解」的聲音轉為拼音字母，意在為兩種語言和文字系統中搭橋以便溝通。然而，他在字母上保留的是何時何地的聲音呢？這種拼音如何建構，也決定所搭之橋是否經久耐用。當代的語言學研究很早即指出文字的語音和拼寫方式(orthography)，會因語言有所差異。也因此，拼音字母對非字母型態(non-alphabetic language)的書寫系統在資訊傳達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在東西文化的接觸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早期以英語為母語的西方傳教士，即明確感受若用字母拼寫漢字，複雜又麻煩。十九世紀早期，蘇格蘭神父馬禮遜便曾告訴他的傳教士同事：「漢字的發音可以聽得很清楚，但是眼睛卻無法從字面上看到。」<sup>63</sup>他試著用字母把漢字的聲音拼寫出來，但是「歐洲各國羅馬字母的用法不盡相同，拼寫漢語音節的方式也不一樣。」把這些因素加總在一起，可以預見東西方以文本交流時，拼寫方式必然會一團混亂。

1815 年左右，馬禮遜曾說：「英語如何拼寫中文，目前的嘗試還太少。歐

洲國家大部分的拼寫都是循著葡萄牙語的模式。」<sup>64</sup>他想強調各地拼寫漢字不一致，應以英語為中心重塑拼寫的新秩序。就為了這個原因，他的任務是為英語備妥一套中文音節表，而且他也做到了。經過多年的努力(1815-1823)，他出版了第一部英漢字典，這部字典以漢字《華英字典》為名，英文的書名為 *Th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共有六冊，從 1815 年開始印製到 1823 年才在澳門印刷出版完畢。字典介紹了 4,642 個漢字。<sup>65</sup>這部字典是後來美國傳教士學習漢語漢字的扣門磚。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漢對照的字典，也是西方人首次在中國境內以活字印刷排版完成的中文書籍。

《華英字典》對衛三畏有很大的影響。衛三畏讚美這部字典「製作工藝和學術水準，都是重要里程碑。」<sup>66</sup>然而，後來衛三畏著手自己的著作時，他並沒有依循馬禮遜的拼寫方式。主要的原因，是馬禮遜的拼寫方法也並不是完全從英語出發，有太多個別的例外 (the spelling ended up not being English-specific, but more individual-specific.)。矛盾的地方是，馬禮遜本來希望以英語發音和拼寫慣例拼寫中文的語音，但是他所用的拼寫方式顯然

<sup>63</sup> 引自：Morrison (1815), p. 1, in Preliminary Remarks.

<sup>64</sup> 引自：Morrison (1815), p. 3。值得一提的，在馬禮遜或更早的時期，曾試著拼寫中文的歐洲語言，也不限於葡語一種。在馬禮遜 1815 年出版英漢字典以前，已有針對持西班牙語和法語的人出版的字典。西語版的中文字典，在 1682 年即寫成，1703 年曾在廣州出版 (*the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編纂者是 Francisco Varo (1627-1687))。法國人在十八世紀初期也曾以拉丁語出版過中文字典。如 *Grammatica Sinica* (1737) 和 *Grammatica duplex* (1742)。法國的傳教士，如 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 在 1728 年編纂了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hinese title: 中國語言志略] 但這本字典一直到 1831 才出版，而且是在馬禮遜協助下才得以完成。

<sup>65</sup> 可參考：趙曉陽(2005)。

<sup>66</sup> 引自 Williams (1889), p. v., in the Preface. 衛三畏在 1834 年抵達廣州後，得到馬禮遜留下的字典。馬禮遜的字典是當時學中文最完備的資源。



混用了其他的語言，而且《華英字典》也混用了一些額外(非英語使用的)的字母。<sup>67</sup>以幾個馬禮遜字典裡音節表(Table of syllables)為例，可以看出這種論點。<sup>68</sup>

首先，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些字母的拼寫和英語字彙中的音值是相同的：

**A**, has the power of *a* in “card”;  
**E**, as in “*me*”;  
**Ow**, as in “*how, cow, and sow*,” when used as a Noun.

在同一個音節表中，以下示例說明所用的拼音字母已超過英文字母的範圍。例如 **Ă** 和 **Ů**，並非英文標準字母，但被用來表示英文的音素(English phoneme)。

**Ă**, as in “Hat”  
**Ů**, as in “But”.

必須一提的是，並非所有中文的音素和音節，在英語中都有類似的發音。遇到這樣的問題時，馬禮遜在《華音字典》中有時是以語文式的說明「描

述」該音值，譬如以下的例子，以 **Aou** 和 **Ee** 說明特定的音值。有時，他用非英語的字彙說明某些音值，如以下案例中以 **U** 表示法文中 *eu* 的發音。這種示例和說明的方法，其實已經讓語言的界線模糊，讀者對於字母是要用英語或其他語言的方式時，無法以直觀或直覺即可判斷。而且每個音節的發音，讀者也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想像。

**Aou**, like open broad coalescing with *oo*;  
**Ee** final, may be pronounced as the preceding (**E** as in *Me*) by learners who have not the assistance of a Native: they mark a sound which our letters do not convey;  
**U**, like the French *eu*, in “**Peu**,” except where in English it would sound short;

另外，這部字典將中文的每個音節(syllable)，以三種拼寫方式表示。馬禮遜自己的解釋是：「第一種是英文，第二種是以葡萄牙語表示中文語音，第三種是廣東方言。」<sup>69</sup>以下是從《華英字典》揀選「我」和「五」所代表的兩個音節為案例，說明馬禮遜如何以拼音字母表達不同的語言。<sup>70</sup>

<sup>67</sup> 探討英語拼音方式(English orthography)的文獻非常富豐。具代表性的參考資料如：Graddol, Cheshire & Swann (1994), Ch. 5; Halliday (1987); Graddol (1996)。

<sup>68</sup> 以下所引的案例，都出自馬禮遜 1815 年出版的字典。詳見：Morrison(1815), p. 4。

<sup>69</sup> 馬禮遜解釋三種拼音書寫的原文：“The first the English, and second Portuguese of the Mandarin Tongue, and the third the Canton Dialect.” 詳見 Morrison (1815), p. 18.

<sup>70</sup> 同前註，p. 18。

漢字	拼寫方式(orthography)	語言/方言
我 (I)	<i>Wo</i>	English
	<i>Ngo</i>	Portuguese
	<i>Go</i>	Cantonese/Chinese

漢字	拼寫方式(orthography)	語言/方言
五 (Five)	<i>Woo</i>	English
	<i>Goei</i>	Portuguese
	<i>Ing</i>	Cantonese/Chinese

表 1：以上兩個漢字與對應的拼寫方式，可以看出漢字和拼音字母能傳達的資訊，分別是視覺和聽覺偏向表徵的呈現。漢字能統合及代表不同的語音，而字母能保留特定時間和空間條件的音值。(資料來源：作者整理馬禮遜 1815 年版字典。)

同一個漢字，因為語言之不同，用字母拼寫時可以形成多種不同的拼寫結果，這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首先，關於音素和音節，每種語言的音素廣度和數量(phonemic inventory)不同，雖然中文的音素數量比英語相對較少，但有些中文的音素並不在英語音素的範圍內。<sup>71</sup>因此馬禮遜在整理漢語音節時，也試著從英語以外其他西方語言中找相同的音值。

其次是關於字母和拼寫規則(orthography)。馬禮遜的拼寫系統中，要標註中文的聲音，26 個標準的英文字母並不夠用，所以他使用了輔音符號(diacritic marks)區分出不同音節。然而英文的拼寫方式其實已混合了不同

的語言的拼寫方法，而且馬禮遜的拼寫方式並不限於英語的拼音，所以用英語的直覺判斷漢字的發音未必準確。

第三點，馬禮遜提供的拼寫方式(orthography)，有助於看到將中文語音以字母拼寫「英語化」(Anglicizing a language)的侷限性和缺點。根據馬禮遜的觀點，要把中文拼音的目的即在將語音之拼寫方式「英語化」(anglicize the sounds)。所以馬禮遜出版字典規範英語的拼寫方式，以和葡語及其他語言有所區別。這種設計其實正是字母型態語言的慣性：依自己的語言設定拼寫字母的位置和順序。語言和書寫系統的研究中，字母是造成語言分化的主因之一。中世紀以前羅馬帝國

<sup>71</sup> 現代中文有 10 個母音，22 個子音，這些音素(phonemes)可以組成四百多個不同音節(syllables)，如將聲調的差異納入，大約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個不同的音節。學者對這些音節數字的區分，有不同的意見。英語的音素情形也類似，大約有 18 到 23 個母音，24 或 25 個子音，大致是因為方言和母音的差異所以數字有所不同。如欲了解漢語漢字的音值，可參考 Taylor & Taylor (1995), DeFrancis (1984), Ch. 6. 或台灣師範大學編纂的《國音學》。

拉丁文是帝國共用的行政語言，但後來地方方言的發展及字母的書寫，鼓勵了地方分權。政治與傳播的歷史研究中，也可以觀察歐洲語言分化和國家建立，字母具有「分權」的效果(decentralized power)。在馬禮遜的字典裡，即可看出中文拼寫的英語化，是要弱化葡萄牙的拼寫方式，建立英語化分權的開始。

第四點。《華英字典》本身即是觀察語言和書寫系統發展絕佳的史料。從字典中的音節表，提供了解文字系統和語言的關係。做為一種書寫系統(script)，漢字可以代表中國的南腔北調及各種方言，文字具有統合語言的功能，亦是統一及行政集權的工具。另一方面，羅馬拼音中字母，能保存特定音值，而且與語言搭配形成特定字彙和拼寫方式。

整體來說，馬禮遜的第一部英漢字典，具體地呈現漢字和拼音字母不同的特質，以及兩種文字系統做為資訊載體本質的差異。也往往要透過這樣的案例，才能比較和檢驗不同書寫系統中的資訊承載能力和容量。語言和文字的技術條件，決定訊息所能傳達的內容。

如果馬禮遜試著為英語建立統一的拼寫方式的努力是成功的，那麼，影響力應該會持續下去。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到了 19 世紀中期和後期，漢字的拼寫方式，陸續都還有頗大的變化。衛三畏的漢語及中國知識，受到馬禮遜的影響，然而後來衛三畏不但

自己也編纂了漢英字典，也另發展了新的拼音規則。這在 1869 年的「清單」上都看得到線索。

## 七、新拼寫方式的誕生

在馬禮遜之後，衛三畏對中國地方方言的探索更深入，以字母拼寫了更多的官話和中國的方言，似乎要拼寫中國各地的聲音對衛三畏來說並不是件難事。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也有愈來愈多的西方人不斷有類似的努力。令人困惑的是，似乎無人能了解漢字到底被多少種語言拼寫成多少種不同的方式，而這些拼寫方式究竟是來自英文、葡萄牙文，法文或其他語言？

衛三畏指出，來到中國的西方人多會以拼音書寫人事物的名稱：「許多旅人或作者拼寫(中國人的)名字，都喜歡依自己所好拼寫，統一寫法幾乎無法辦到。」<sup>72</sup>但如果衛三畏對這種拼寫混亂的現象很失望，他在準備「清單」時，是不是又循著某種標準的拼音法式(standard transliteration scheme)呢？

二十世紀的漢學文獻，漢學家最常採用威妥瑪的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拼寫漢字。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Frances Wade, 1818-1895)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首位中文講師，曾在中國生活四十年以上，擔任過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拼音系統」(Wade transliteration scheme)是他在中國期間所創立，他 1867 年出版過英漢字典《語

<sup>72</sup> 這是衛三畏在 1883 的筆記。

言自邇集》，即是採行自創的拼音系統。<sup>73</sup>衛三畏是在這部字典出版兩年之後，才進行「清單」的編寫，但是「清單」的拼音方式，其實與威妥瑪系統很不一樣。威妥瑪拼音法式既是依英語的拼寫方式設計漢語拼音，也很快成為當時的漢語教材及主流的拼音方法，衛三畏「清單」的拼寫方式為什麼和威妥瑪式很不一樣？

事實上，準備「清單」時，衛三畏已是當時漢學界的頂尖人物。他最有名的作品《中國總覽》(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於 1848 年出版，而且在十九世紀內及二十世紀多次再版，成為漢學的重要參考著作已超過百年以上。<sup>74</sup>他如何拼寫漢字，對所有的讀者和作者都有影響。

但是「清單」上的字的拼寫方式，似乎並沒有遵循任何一套至今所知的規則，原因最有可能和語音有關。由於「清單」出自向來謹慎而且重視細節的漢學家的手筆，他對漢字的拼寫方法值得仔細推敲。首先，他的拼寫方式與威妥瑪式有相似之處，都使用了輔音符號(ayn)「'」。這個符號類似標點符號逗號「，」倒寫，用來代表送氣的輔音。這種標示是比馬禮遜系統提供更進一步的發音細節的標示方式。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在 1818-1823 年間陸續出版，衛三畏的拼寫方式與馬禮遜系統較為接近，但又不盡相同。

	Morrison 1815	Wade 1867	Williams 1869 (1874)	Wade 1886	Wade-Gile 1912	Pinyin 1958
	粵語	官話	粵語	官話	國語	普通話
皇	hwâng	'huang	hwang (.hwang)	huang	huang	huang
清	tsing	ch'ing	ts'ing	ch'ing	ch'ing	qing

<sup>73</sup> 威妥瑪爵士最早的字典《語言自邇集》，出版於 1867 年。在 1889 年時，出版第二版的字典，第二版已是三冊的大型字典。這兩個版本中對輔音符號的使用，一些字的音質，略有不同。舉例來說，書名中的「邇」在兩個版本中的拼寫方式便已有不同。邇在第一版中拼寫為 *erh*，第二版則為 *êrh*。第一版書名的拼音是 *Yü-Yen Tzū-Erh Chi*，第二版則是 *Yü Yen Tzū Êrh Chi*。可參考：關維民(2002), p. 34-6。

<sup>74</sup> 衛三畏所著的 *The Middle Kingdom* 《中國總覽》出版於 1848。Thompson (1961: 251) 指出該書 “was to become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single work in English on China. First published over a century ago, it has the unusual distinction of still being a standard reference work.”

經	king	ching	<b>King</b>	ching	ching	jing
解	kiai	chieh	<b>kiai ( 'chié)</b>	chieh	chieh	jie

表 2：根據不同版本字典，漢字的拼寫結果對照。

威妥瑪爵士是在 1859 年出版他針對到中國的外國人學習漢語時所寫漢語教材《尋津錄》(*Hsin Ching Lu, Peking Syllables*)，接著在 1967 年時改編出版為字典。如果完全用威氏的方式拼寫，「皇清經解」四字會是 **Huang Ch'ing Ching Chieh**。威氏來華的目的和衛三畏不同，他不像衛三畏剛來時是傳教士，威氏 1840 年代早期來華是英國軍隊的一員，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他受聘為翻譯後來成為外交官。<sup>75</sup>從這個脈絡來看，威氏發展拼音系統的目的，是為了「協助領事館學漢語的學生，以最省時的方法學會該國官方口語，同時能讀官方的文書，不管是書冊、正式的公文書，或是任何公眾人物的文件。」因此，這套系統完全是針對北京的官話而設計，刻意忽略其他的中國方言。<sup>76</sup>威氏希望他的系統能成為國際間共用的工具，但是法國和德國的漢學家們，顯然偏好他們自己語言的拼寫方式。<sup>77</sup>

衛三畏來華時是傳教士，工作項目也包含印刷和編輯。他一手建立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廣州的印刷廠。他在華的第一個二十年期間(1833 年到 1853 年)，他與傳教士在一起，也和當地人接觸。第二個二十年(大約是從 1856 年到 1876 年)，工作從印刷廠轉為代表美國政府，在駐北京公使館擔任代辦(*Chargé d'affaires*)，一直到 1876 年他辭去職務返回美國。衛三畏比當時其他的外國人更廣泛地接觸到人民及各地的語言。而且他對漢語官話(*Mandarin*)的素養極高，也熟悉不少地方的方言，更特別的是，他在著作中常把各地的語言記錄下來。

衛三畏是位著作豐富的漢學家，他的作品數十年來一直維持著一致的拼寫方式。但是他的拼寫原則從未成為主流的拼音系統，因為他總有各種考量。在 1890 年代晚期，衛三畏曾對

<sup>75</sup> Cooley(1981)在書中介紹了威妥瑪爵士在中國的職涯發展。

<sup>76</sup> 引自：Wade(1867), p. iii, Preface.

<sup>77</sup> 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對十九世紀晚期威妥瑪拼音系統的功能和目的曾有評述，值得參考。“*One of the chief aims of the Wade system was that it should be capable of international use, and this was why (as can be seen from able I) he did not employ English sound only. Unfortunately, this internationally effort was not accepted by French and German Sinologists, who worked out, and have continued to use, systems which are useful only for those who have these languages as their mother-tongues. Thus the French system has forms such as tcheou (for chou), cheu (for shih), tchang (for chang), etc., while the German has liän (for lien), tschou and so on. Wade's system was also logical in that it concentrated on a single dialect, namely the northern form of the 'mandarin' group, which now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the Kuo Yü, or national, pronunciation.*” 詳見 Needham (1954), p. 26

自己的「發音系統」(system of pronunciation)提出這樣的看法：「語音是依循馬禮遜字典中的發音書寫。但不是用他的拼音方式。」衛三畏初到中國時，就是由馬禮遜牧師教他中文，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清單」上的拼音比較接近馬禮遜的拼寫方法。衛三畏自己的拼寫方式對漢字語言提供較高的辨識細節，這在衛三畏自己編纂的字典中很明顯也看得出來。

比較衛三畏和威氏對「皇清經解」後兩字「經解」的拼寫方式，衛三畏是 King Kiai，威氏則為 Ching chieh，可以看出輔音(子音)和元音(母音)的音值並

不一樣。這樣音值不同的模式，同樣見於清單上其他的出版品。譬如《本草綱目》在「清單」上拼寫為 Pun Tsai jabg Nuh(如果用威氏拼法會是 Pen Ts'ao kang Mu)；《針灸大成》拼寫為 Chin Kiu Ta Ching(威氏則為 Chen Chiu Ta Ch'uan)。可見漢字的拼寫方式，在十九世紀末的英語各式通信書簡或出版品中，非常不一致，而漢字的字體字形結構千餘年來較為穩定。漢字的拼音方式到了二十世紀仍有非常多的變化和發展，但美國逐漸建立了較統一的書籍編目資料工具及資訊管理系統，這些議題暫時不在本文探究的範圍內。

78

---

<sup>78</sup> 欲了解美國各圖書館系統如何管理中文書目(Chinese collections in U.S. libraries)，及處理漢字書目資訊在二十世紀的後續發展，可參考作者未出版的博士論文的其他章節，Yang(2008)。

### 參考文獻

-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59)。
- 宋晞，〈美國的漢學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2)。
- 尹文涓，〈中國叢報與 19 世紀西方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2：2(臺北，2003)。頁 28-36。
- 何九盈，《漢字文化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 杜維運，〈英國的漢學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臺北：國防研究院，1962)。頁 221-140。
- 周有光，《比較文字學初探》(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
- 周有光，《漢字和文化問題》(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 柏楊，《中國人史綱》上下冊，(臺北：星光出版社，1992)。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國音學》(臺北：正中書局，2002)
- 趙曉陽(2005)。19 至 20 世紀外國人研究北京方言的文獻資料。《北京檔案史料》，2005 年第 4 期。
- 趙曉陽，〈19 至 20 世紀外國人研究北京方言的文獻資料〉。《北京檔案史料》，2005：4。
- 錢存訓，《中美書緣》(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8)。
- 瞿立鶴，《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
- Bích, Nguyễn Ngọc (1984). *The State of Chữ Nôm Studies: The Demotic Script of Vietnam. Vietnamese Studies Paper*. Fairfax, VA: Indochina Institute &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 Boltz, William G. (1996). Early Asian Writing Systems. In P. T. Daniels & W. Bright (Eds.) *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pp. 189-9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erome (1979). *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40, June). A Note on an Early Logographic Theory of Chinese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 189-91.
- Coulmas, Florian (1989). *The Writing Systems of the World*.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Inc.
- DeFrancis, John (1950).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Francis, John (1950).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nnett, Tyler (1941).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in 1922).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Fairbank, John K., Reischauer, Edwin O. & Craig, Albert M. (1978). *East Asi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New Impression*. Boston &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Glahn, E. (1973). Signs and Meanings: Chinese Writing through Four Millenia. In A. Toynbee (Ed.).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 Hudson. pp. 15-30.

Goodman, Roy & Swiggers Pierre (1994). John Vaughn (1756-1841) and the Linguistic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8(2): 251-72.

Graddol, David; Cheshire, Jenny; & Swann, Joan (1994). *Describing Language* (2<sup>nd</sup> ed.). Bristol,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Graddol, David; Leith, Dick & Swann, Joan (Eds.). (1996). *English: History, Diversity, and Change*. London & New York: Milton Keynes.

Gutzlaff, Charles (1838).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vised by Rev. Andre Reed, D.D.) V. 1.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Halliday, M. A. K. (1987). Spoken and Written Modes of Meaning. In R. Horowitz and S. J. Samuels (Eds.). *Comprehending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Hannas, WM. C. (1997).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sü, Immanuel Chung Yueh (1995).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The Fifth Edit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 Shu Cha [胡述兆]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Jensen, Hans (1969). *Sign, Symbol and Script: An Account of Man's Effort to Write* (3<sup>rd</sup> e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1917).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e, Erika. (2016).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Simon and Schuster.

Leland, Charles G. (Ed.) (1910). *Pidgin-English Sino-Song or Songs and Stories in the China-English Dialect*. (8th E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Liu, Ta Jen. [劉達人] (1992).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Official Relations 1840-1990*. [中美外交關係史]. Yangmingshan, Taipei: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陽明山，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 Logan, Robert K. (1986). *The Alphabet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 Logan, Robert K. (2000). *The Sixth Language: Learning a Living in the Internet Age*. Toronto & New York: Stoddert Publishing Co. Limited.
- McLuhan, Marshall. (2002).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 of Man* (10<sup>th</sup>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4)
- Needham, Joseph (1954).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Volume 1. In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eira, Thomas (1961).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Via Dei Penitenzieri, 20.
- Qiu, Xigui [裘錫圭] (2000). *Chinese Writing* [文字學概要]. Early China Special Monograph Series No. 4. Berkeley, CA: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Berkeley.
- Que, Weimin [關維民] (2002, Februar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at Cambridge [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21(1), 31-43.
- Robert, Paul (1977). *Le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S. E. P. R. E. T.
- Roth, Rodris (1988). Tea-Drink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Its Etiquette & Equipage. In R.B. St. George (Ed.). *Material Life in America*,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439-62.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 Toronto: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Seeley, Christopher (1991).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Leiden & New York: E. J. Brill.
- Smith, Murphy (1983, June 16). Peter Stephen DuPonceau and His Study of Language: A History Accoun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27(3): 143-179.
- Taylor, Insup & Taylor, M. Martin (1995).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oynbee, Arnold (Ed.). (1973).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Tsien, Tsuen-Hsuei [錢存訓](1964/65), 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 19-30.
- Williams, Frederick Wells (1888).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 G.P. Putnam's Sons.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89).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89).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ison, Ming & Cayley, John (Eds.). (1995).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The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Yang, Jyh-Ming (2008). *Lost in Transliteration: The Tolerance of Intelligibility in  
Chinese References in Western Bibliographic Practic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

**筆者介紹：**

楊 智明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傳播學博士。研究專長  
為媒介生態研究(Media Ecology)、資訊傳播科技以及資訊傳播理論。